

曹敏华 欧阳小松 著

福建改革开放的历程

Fujian Gaige Kaifang de Lich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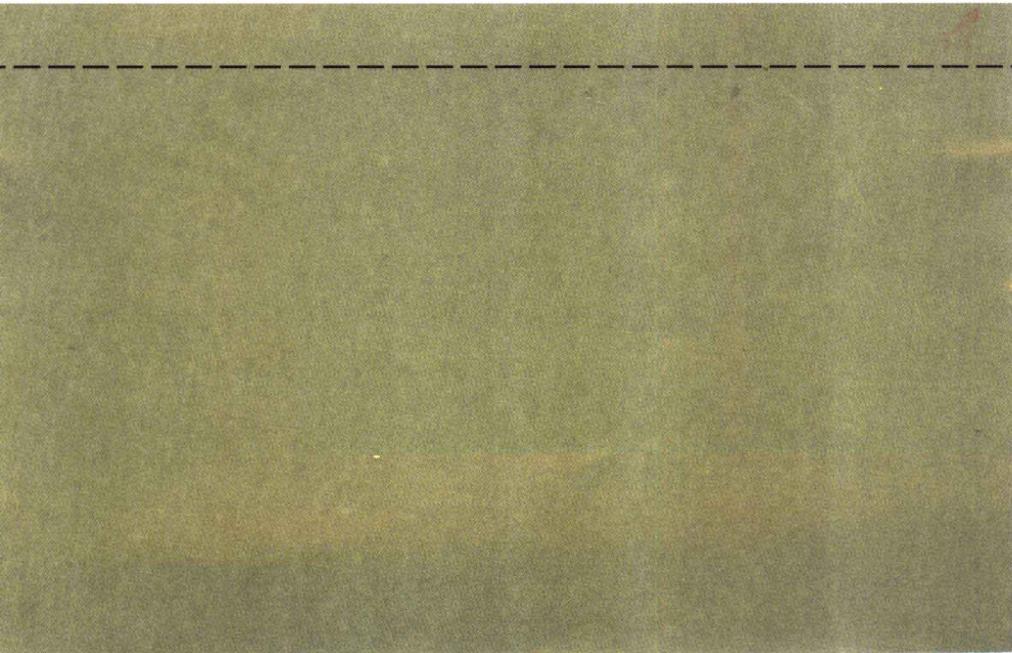
厦门大学出版社

曹敏华 欧阳小松 著



福建改革开放的历程

Fujian Gaige Kaifang de Liche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建改革开放的历程/曹敏华,欧阳小松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1

ISBN 7-5615-1877-3

I . 福… II . ①曹… ②欧… III . 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福建省-1978~2001 IV . D619.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7754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xm.fj.cn

三明地质印刷厂印刷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55 千字 印数:1-1 000 册

定价:2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前　　言

1978年，当代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这一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战略决策，并确立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从此，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迅猛前进。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社会试验。实践的结果，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古老的华夏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场历史大变革中，作为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和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福建，充分运用中央赋予的各项优惠政策和措施，努力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地向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开拓前进，经过20年的努力，由昔日的海防前线变成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为先进的省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初具规模，并积累了不少具有全国意义的宝贵经验。作为这场历史变革的亲历者，20年来我们切身感受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蓬勃生机，听到了八闽儿女向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阔步前进的跫然足音。时代催促着我们将自己对这一段历史的观察和思考记录下来。编写本书的目的在于探索福建改革开放的发展规律和时代特点，总结基本经验和教训，为今后福建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借鉴。

在这部20多万字的著作中，我们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例来展现福建改革开放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力图比较清晰地勾画出福建农村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沿海及山区对外开

放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轨迹，同时多视角地再现 20 年间福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与成就，科教兴省的举措及成效，闽台关系发展变化的趋势，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对福建省改革开放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本书依据福建改革开放的演进轨迹，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78 年底到 1983 年，这是福建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从 1984 年到 1988 年，这是福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的重要阶段。第三阶段，从 1989 年到 1991 年，是福建治理整顿与改革开放并举的阶段。第四阶段，从 1992 年到 1998 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里程碑，福建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这是福建自 1978 年以来，改革开放措施出台最多、经济发展势头最好的时期。本书的第一到第四章，记述了这四个阶段福建改革开放的发展趋势。不难看出，福建的改革开放是全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20 年来每一历史阶段中福建改革开放措施的出台，都与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重大决策和全国改革开放的形势息息相关。因此，我们不是孤立地研究福建的改革开放，而是将其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整体、宏观的考察和研究，从而揭示福建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另外，我们在论述每一阶段经济体制各个方面的改革时，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注重突出重点，以使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福建经济体制改革的鲜明特征。本书的第五章则运用社会学的若干理论和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社会的变迁情况作比较详细的论述。

从一定意义上说，20 年间福建的巨大变化是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缩影。在世纪之交回顾这段辉煌的历程，将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进而激励人们为创造新的光辉业绩而继续奋斗。但愿本书的问世能使更多的人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并引起学术界对福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更深入的研究。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福建改革开放的勃兴	(1)
第一节 十年动乱后的困境与新的转机	(1)
一 十年动乱留下巨大创伤	(1)
二 拨乱反正与各项事业的复苏	(4)
三 奏响改革开放的序曲	(8)
第二节 农村改革先行	(13)
一 万事开头难	(13)
二 包出一片新天地	(16)
三 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意义	(22)
第三节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	(27)
一 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探索	(27)
二 外贸体制改革拉开帷幕	(31)
三 “三多一少”:城市商品流通体制新格局	(35)
四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之尝试	(38)
五 金融体制改革的启动	(40)
第四节 从海防前线到对外开放前沿	(43)
一 厦门经济特区的兴建	(43)
二 对外经济联系与合作的开拓性举措	(47)
三 由“三来一补”到“三资”企业的创办	(51)
第五节 营造精神家园	(53)

一	三明：一座新兴的文明城市	(54)
二	众手浇出文明花	(58)
第六节	闽台关系谱新篇	(60)
一	新时期闽台关系变化的缘起	(60)
二	闽台交往的先导	(65)
第二章	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与对外开放格局 的初步形成	(71)
第一节	企业改革渐入佳境	(71)
一	“松绑放权”	(71)
二	“包”字进城和股份制改革的开始	(75)
第二节	从乡土社会走向工业文明	(83)
一	农村流通领域改革交响曲	(84)
二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	(88)
三	乡镇企业独领风骚	(90)
第三节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	(95)
一	财税改革新趋向	(95)
二	新金融体系的构建与金融市场的开拓	(97)
三	商品流通新体制	(100)
第四节	综合改革试验初见成效	(104)
一	改革开放综合试验方案的问世	(104)
二	石狮：一个民营特区的崛起	(106)
三	万绿丛中一片红：三明集体林区综合改革试验	(112)
第五节	活跃的闽东南沿海开放地带	(115)
一	闽都敞开古老的大门	(115)
二	闽海掀起开放潮	(120)
三	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扩大在闽投资规模	(129)
第六节	敞开山门招商引资	(131)
一	推进山区对外开放战略的提出	(131)

二	舞起旅游业龙头,引导外向型经济发展	(133)
三	脱贫致富奔小康.....	(134)
第三章	治理整顿时期的改革与开放.....	(139)
第一节	治理整顿任务的基本完成.....	(139)
一	跌入经济无序的误区.....	(139)
二	理性的思考与治理整顿的实绩.....	(141)
第二节	治理整顿期间综合改革的动向.....	(144)
一	农村改革的深化.....	(144)
二	企业改革的进展.....	(148)
三	“调放补管”:价格体系改革的推进	(153)
四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	(154)
五	住房制度改革的多方面探索.....	(156)
第三节	在逆境中坚持对外开放.....	(159)
一	疾风知劲草.....	(159)
二	鼓励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 与农业综合开发.....	(160)
三	台商投资区的设置.....	(163)
第四章	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目标迈进.....	(166)
第一节	邓小平南方谈话推动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	(167)
一	又一篇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167)
二	迈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	(170)
第二节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173)
一	深化三项制度改革.....	(173)
二	殊途同归:采用多种形式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176)
三	通向现代企业制度之道.....	(178)
第三节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新趋势.....	(180)
一	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全面推开.....	(180)
二	宁德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四种模式.....	(181)

三	农村产业结构的重组优化.....	(183)
四	县级综合改革涟漪涌动.....	(185)
第四节	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	(188)
一	分税制改革与新税制的出台.....	(188)
二	金融体制改革迈出新步伐.....	(191)
三	价格、流通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	(192)
四	新突破:外贸体制的综合配套改革	(195)
第五节	大开放、大发展新格局的确立	(197)
一	对外开放新战略的提出.....	(197)
二	世纪之交展宏图:中共福建省第六次代表大会 的召开.....	(200)
三	增创厦门经济特区新优势.....	(201)
第六节	闽台关系的新发展.....	(204)
一	互补互利共同发展的闽台经贸合作.....	(204)
二	闽台“三通”的进展.....	(216)
三	闽台文化交流日益热络.....	(221)
第七节	科教兴省.....	(236)
一	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创新.....	(236)
二	深化教育改革,建设教育强省	(247)
三	海外赤子,捐资办学	(259)
四	改革开放 20 年福建教育的崭新成就	(263)
第八节	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推进.....	(266)
一	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共领导的 多党合作三大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267)
二	村民自治在福建的实践与发展.....	(278)
三	新时期福建加强法制建设的成就.....	(282)
第五章	世纪末的社会风貌.....	(290)
第一节	改革开放对福建社会变迁的巨大影响.....	(290)

一	城市建设透视:空间·建筑·美化	(290)
二	小城镇自画像:农村城市化的新模式	(292)
三	人口的变化	(295)
四	家庭的变化	(302)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两大社会问题		(304)
一	流动人口的膨胀	(304)
二	下岗职工的困境与出路	(307)
结束语:总结经验,迈向新世纪		(312)
后记		(317)

第一章 福建改革开放的勃兴

1966至1976年的十年内乱，使福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经济跌入全国落后省份的行列。1978年12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战略决策，从此，中国走进了改革旧的体制、实行对外开放的新时期。历史的潮流把福建推向了改革开放的前沿。从1979年到1983年，福建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起步，进而转向城市，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外贸体制和财税体制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试验；同时，运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兴建厦门经济特区，实施一系列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开拓性举措，为福建经济的振兴与腾飞奠定了基石。尽管这一时期改革还是局部的，开放是有限度的，但毕竟使福建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机，八闽大地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第一节 十年动乱后的困境与新的转机

一 十年动乱留下巨大创伤

从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动乱是当代中国的一场深重灾难。由于长期“左”的错误不断发展，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内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一场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政治大革命”。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颠倒是

非，制造混乱，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社会政治问题比比皆是。在经济领域，林彪、“四人帮”推行他们的反动经济纲领，公开宣称：“不为错误路线生产”，严重地冲击了工农业生产和财政金融，致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四人帮”及其在福建亲信的严重干扰破坏下，1976年福建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倒退的险恶局面。钢产量仅6.47万吨，^①为1971年以来最低的年产量。全省县以上工业企业约有15%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晋江地区停产半停产的工厂占52%；^②仅泉州市的工业企业亏损就达338万元，亏损占用银行贷款182万元^③；三明钢铁厂1976年仅生产5万吨钢，亏损达1062万元，被列为全国125户重点亏损企业之一，成了全省闻名的“老大难”单位。^④据不完全统计，1976年全省工商企业用贷款弥补亏损一项就高达3000多万元。^⑤由于一些单位随意提高工资标准，或以滥发补贴、私分福利等方式变相提高工资，冲击了国家统一的劳动工资计划，迫使银行扩大工资投放量，1976年的全省工资性现金支出比1975年增加了5500万元，^⑥是货币投入大幅度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1976年的福建货币发行量相当于1975年的4倍多，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困难时期的1961年外，投放货币最多的一年，使福建

^① 福建省统计局编：《福建奋进的4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

^② 统计数字参见程治材在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程治材时任福建省工交办副主任。

^③ 统计数字参见程治材在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程治材时任福建省工交办副主任。

^④ 参见王芳芹：《继续攀登高峰为四化多做贡献》（在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⑤ 《省人民银行林敬耀同志1977年11月29日在省直机关揭批“四人帮”及其亲信的反革命罪行大会上的书面发言》。

^⑥ 《省人民银行林敬耀同志1977年11月29日在省直机关揭批“四人帮”及其亲信的反革命罪行大会上的书面发言》。

市场货币流通量大大超过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对生产建设、金融物价以及人民生活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此外,福建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76年粮食减产4亿公斤,粮食征购比1975年减少19.8%;^①财政收入1976年比1975年减少7.1%。^②

在政治上,“四人帮”在福建捣乱破坏所造成的恶果也是极其严重的。“四人帮”在福建的亲信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歪曲和篡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致使群众思想混乱,党的组织涣散,全省1/3的县、1/4的公社和一批厂矿企业领导班子瘫痪和半瘫痪,^③部分地方和单位被“四人帮”及其亲信的帮派势力篡夺了领导权。他们非法开除、撤免干部,仅莆田、晋江两个地区生产队以上干部被开除、撤职、罢免的即达3200余人,突击提干、突击发展党员各达4000余人。^④

十年动乱使福建教育事业元气大伤。福建原有普通高等学校10所,曾一度被砍得只留下3所,1976年和1966年相比,在校大学生人数减少了25%。^⑤全省中等师范学校、农业职业中学和半工(农)半读学校以及省、地、县三级教师进修院校全部停办,近百万平方米校舍被侵占。据不完全统计,仅财产和设备方面的损失即达

① 廖志高:《在福建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1977年12月28日报告,1978年1月3日通过)。

② 郭亮如:《在福建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郭亮如时任省财办副主任兼财政局局长。

③ 廖志高:《在福建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1977年12月28日报告,1978年1月3日通过)。

④ 廖志高:《在福建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1977年12月28日报告,1978年1月3日通过)。

⑤ 《省教育局廖焕基同志1977年11月29日在省直机关揭批“四人帮”及其亲信的反革命罪行大会上的发言》(油印稿),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档案室藏。

五六千万元以上^①，大量珍贵的图书资料和各种动植物标本被毁坏或散失。全省青壮年中文盲和半文盲达360万人^②，学校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上述情况表明，经过十年动乱，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福建经济和政治陷入混乱状态，文化教育事业横遭摧残，福建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一场浩劫，留下巨大的创伤。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立即着手拨乱反正，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便成了福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的当务之急。

二 拨乱反正与各项事业的复苏

毛泽东逝世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加紧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人们更为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而忧心忡忡。在“四人帮”得寸进尺、咄咄逼人的情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认识到必须采取果断措施，除掉这个祸国殃民的毒瘤。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骨干分子进行隔离审查，从而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中国人民自此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

粉碎“四人帮”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通报“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号召全党紧密团结起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

^① 参见《省教育局廖焕基同志1977年11月29日在省直机关揭批“四人帮”及其亲信的反革命罪行大会上的发言》(油印稿)，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档案室藏。

^② 参见《省教育局廖焕基同志1977年11月29日在省直机关揭批“四人帮”及其亲信的反革命罪行大会上的发言》(油印稿)，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档案室藏。

争。从 1976 年 12 月开始,中共中央连续三次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的材料,中央和地方报刊均以很大的篇幅刊登有关声讨和控诉“四人帮”罪行的文章。一场群众性的批判高潮迅速在全国掀起。其时,福建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开展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斗争。省直机关及各个系统先后召开了揭批“四人帮”及其亲信的反革命罪行大会。晋江地区是深受“文化大革命”祸害的“重灾区”。中共福建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晋江地区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解决晋江地区存在问题的若干意见,要求晋江地委端正思想路线,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清查有牵连的人和事。12月中旬,省委和福州军区党委派出 741 名军队干部、30 名战士和 14 个连队进驻晋江地区,与当地党委密切配合,开展揭、批、查工作。至 1977 年 7 月,经过 8 个多月的斗争,该地区 7 个县(市)重点清查了 843 人,基本查有清的 460 人,解脱了 218 人;清查涉及篡党夺权活动的重大问题 119 个,查清了 97 个。到 1978 年底,福建的揭批斗争基本结束。通过这场斗争,摧毁了林彪、“四人帮”在福建的帮派体系,揭露和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及种种罪行,收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初步肃清了“四人帮”的流毒。同时整顿了各地领导班子,对机关和少数问题较多的工厂企业等单位的领导班子也进行了调整。毋庸讳言,由于十年动乱,“左”的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在清查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带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在告别十年动乱岁月后,福建各级党组织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实事求是地进行了研究和处理,调整了社会关系,党的各方面政策开始得到落实。1978 年 4 月,中共中央发出 11 号文件,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9 月,中共中央又发出 55 号文件,同意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根据中央文件精神,福建省委

着手开展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许多在 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得到平反改正，恢复了政治名誉，安排了工作。与此同时，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错误也开始得到纠正，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陆续调整或重建组织机构，逐步恢复正常工作。在对待宗教问题上，纠正了违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做法，恢复了信教群众正当的宗教活动。在侨务工作中，着手纠正因所谓“海外关系”而歧视、迫害归国华侨和侨眷的现象。据统计，全省先后复查并解决“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案件 27 万多件、历史老案 1.7 万多件，一大批含冤受屈的老地下党员和老同志的名誉得到恢复。总之，拨乱反正工作纠正了“左”的错误，在政治上、精神上解放了数以万计的干部和各界人士，从而调动了他们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巩固了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成效。当然，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全面展开的，而在此之前的一系列工作的开展，对揭批“四人帮”和动员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党在领导广大人民逐步开展拨乱反正时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最初的文字表达，出现在由汪东兴布置、为华国锋准备的一份会议讲话稿中，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这份讲话稿的主要内容于 1977 年 2 月 7 日作为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发表，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很快，人们便将这两句话概括为“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表面上是旨在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和领袖形象，实际上是不肯纠正其晚年的“左”倾错误，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错误决策迟迟得不到纠正，造成了党和国家在徘徊中

前进的局面。于是，走在拨乱反正斗争前列的许多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对究竟应当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和决策、检验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预示着由“文化大革命”造就的思想樊篱，不再是人们难以逾越的障碍。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人们对真理标准问题的热烈讨论，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公开表明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观点，从而推动着这场讨论蓬蓬勃勃地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起初，由于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受“两个凡是”观点的束缚，福建的一些地区对这场讨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够深刻，开展得也不得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领导干部才提高了思想认识，结合学习、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和落实政策，比较认真地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并把补课任务布置到基层。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福建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加快了拨乱反正步伐，为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清除“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发展经济、争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为了推动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中央先后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要掀起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在1956年写的《论十大关系》一文。随之掀起的学习热潮，对调整经济关系、整顿经济秩序、发动广大群众大力发展生产起到了动员的作用。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福建全面开展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整顿工作：工业经济增长率从1976